

現代歐美語言學 唯心主義學派批判

M. M. 古赫曼等著

科學出版社

現代歐美語言學唯心主義學派批判

蘇聯 M. M. 古赫曼等著

岑 麒 祥 譯

科 學 出 版 社

1958

現代歐美語言學唯心主義學派批判

M. M. 古赫曼 著
蘇聯 O. 列施卡

岑麒祥 譯

*

科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 117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61 號

中國科學院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1958 年 3 月 第 一 版
1958 年 3 月 第一次印刷
(京) 0001—2,175

書號: 1059 字數: 65,000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2 1/2

定價: (9) 0.34 元

序

這裏所收的三篇論文，第一篇原名“Против Идеализм и Реакци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Американском Языкознании”，載《蘇聯科學院通報，文學和語言部分》，第11卷，1952年，第4期，第二篇原名“Сепир и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載蘇聯科學院出版的《語言學問題》雜誌，1954年，第1期，第三篇原名“К Вопросу о Структурализме”，載同上雜誌1953年，第5期，都是蘇聯語言學家們近年來所作批判現代歐美語言學中唯心主義學派的著作。

自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一書出版後，蘇聯語言學界面臨着一個偉大的任務：“把馬克思主義灌輸到語言學中去”。為了完成這個任務，他們首先要：一方面清除馬爾“語言新學說”對蘇聯語言學的影響，另一方面批判西方語言學的唯心主義學說。這裏所收的三篇論文都是他們這種努力的一種表現。

這三篇論文有一個特點，就是要從理論方面找出現在歐美流行最廣的三個語言學流派（布龍菲爾德的“機構主義”、薩丕爾的“觀念主義”和舊布拉格語言學學會的“結構主義”）的哲學基礎而予以有力的批判。為了確立馬克思主義語言學，這是非常必要的，因為這些唯心主義的學派，我們雖不能說其中毫無可取之處，但是我們必須在否定的原則下才談得上批判地接受它們的某些可取的論點，適當地吸取其中某些有用的材料。

近幾年來，蘇聯語言學有了很大的發展，尤其是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閉幕以後，蘇聯語言學界對於對待西方資產階級語言學學說的態度有了某種程度上的改變。他們已不能滿足於單純從哲學基礎方面去批判它們的錯誤觀點和方法，而是要求深入研究它們的各種論點，發現其中可供我們參考的地方，因此諸如薩丕爾究竟是不是

一個種族主義的語言學家，結構主義對各方面的影響怎樣等問題都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這是很值得我們深思的。但是這並不等於承認這些學派的觀點和方法是沒有問題的。本書第二篇論文對於薩丕爾的評價雖然有某些偏激的地方，但是其主要目的只在分析薩丕爾的語言學觀念的發展及其所領導的“觀念主義”學派對於美國人種語言學的影響，這篇論文仍然是很值得我們參考的。

我翻譯這三篇論文的用意只在給我的學生以一些參考的資料（我在所編的《普通語言學》一書中曾採用過其中的某些論點），現在把它們刊印出來以供各方面參考，在譯文方面如有錯誤或不妥當的地方，希望讀者不吝賜予指正。

譯者，1957年9月，於北京。

內 容 提 要

本書收集了三篇蘇聯語言學家批判歐美語言學的唯一主義學派的論文。這些論文的特點都是從理論方面找出現在在歐美流行最廣的三個語言學流派（機構主義，觀念主義，結構主義）的哲學基礎而給予有力的批判。《反對現代美國語言學中的唯一主義和反動派別》一文作者古赫曼指出布龍菲爾德的描寫語言學理論是機構主義的脫離意義的描寫分析，是唯一主義的學說。在《薩丕爾和“人種語言學”》一文，作者古赫曼指出了薩丕爾的種族主義的語言學理論是反動的。所謂語言模型影響着文化類型，這是荒謬的說法。在《關於結構主義的問題》一文，作者列施卡論述了布拉格語言學學會中的兩種語法觀念，指出雅各布孫等人的理論是唯一主義的，加夫拉涅克等人的語言學理論是正確的。這些論文對於認識歐美語言學都是很有幫助的。

目 次

序.....(i)

反對現代美國語言學中的唯心主義和反動派別(布龍菲爾德和
“描寫”語言學).....M. M. 古赫曼(1)

薩丕爾和“人種語言學”(論現代美國語言學中的反動觀念之一)
.....M. M. 古赫曼(21)

關於結構主義的問題(布拉格語言學學會中的兩種語法觀念)……
.....O. 列施卡(46)

反對現代美國語言學中的 唯心主義和反動派別

(布龍菲爾德和“描寫”語言學)

M. M. 古赫曼

近幾十年來，美國語言學在它的統治派別中，跟哲學、心理學、人種學和人類學中的反動流派靠攏得更加緊密了。

美國語言學的“理論基礎”和“邏輯”實證主義、行為主義、種族主義人種心理學的共同點不僅表現在對語言科學的內容和任務所下的定義上面，不僅表現在對語言學上最重要的問題（語言和它的特點的定義，語言和思維的相互關係的理解）作荒謬的解答上面，甚至在語言分析的原則和方法上也暴露了出來。我們不應該忘記這樣的一種情況，即：帝國主義反動派的“哲學”常常是以語言分析的形式出現的（參看卡爾納普的《邏輯的句法》或者柯日布斯基、李、哈雅卡瓦之流的“語義學派”的著作*）而且有些歪曲到了極點的語言學概念被他們採納了用來作武器。

由布龍菲爾德（L. Bloomfield）和薩丕爾（E. Sapir）這兩個最“有威信的”美國語言學家所開拓的道路對於近幾十年來美國語言學的命運是有特別重大意義的。布龍菲爾德於1926年就在一篇“綱領性的”論文裏表示過他和行為主義的基本原理完全一致^①。這種反

* 卡爾納普（Carnap）——“邏輯”實證主義者，曾著有《語言的邏輯語法》，《科學的統一》等書。柯日布斯基（Alfred Korzybski），李（Lee），哈雅卡瓦（Hayakawa）都是美國“語義學派”的主要人物——譯者。

① 《語言》（Language）雜誌，第2卷，1926年，第3期。

動的機構主義的觀念是和實用主義緊密地聯系着的，布龍菲爾德直到他的生命終結的時候（1949年）還堅信着它。行為主義和實用主義構成了布龍菲爾德語言學體系的“理論基礎”，他自己把它叫做“機構主義”或“物理主義”。

1936年布龍菲爾德發表了一篇專文^①，鄭重聲明他的觀點和卡爾納普、紐拉特（O. Neurath）等“維也納小組”的觀念是相同的。布龍菲爾德觀念的這個“發展”路線和現代主觀唯心主義和不可知論最反動的代表們的相符合絕對不是偶然的；這只是他的語言學觀念的行為主義基礎的後果。布龍菲爾德和“邏輯”實證主義“活動家”間的私人關係很快就建立了起來。布龍菲爾德參與了所謂《國際百科全書》的出版工作，其領導人中包括着戰爭販子、反動分子和黑暗勢力羅素、卡爾納普、莫里斯（Morris）等人。布龍菲爾德在這一部叢書中刊印了他的一本專著叫做《科學的語言學方面》^②，這名稱對於“統一的科學”是可以作為特徵的。20多年間，布龍菲爾德這位現代美國語言學統治派別的理论家就這樣始終不渝地和帝國主義反動派的哲學——實用主義和“邏輯”實證主義聯系着。

薩丕爾的“聯系”有些不同。他的新康德派的觀念主義從20年代的末葉起，日益帶上了更確定的種族主義的色彩^③。與種族主義的人種心理學的聯系就是薩丕爾在最近十年中的活動的特徵。薩丕爾的“模型理論”被狂妄的種族主義者——賓涅狄克特（R. Benedict），克魯克洪納（C. Kluckhohn）等利用着。薩丕爾的門徒沃爾夫（B. Whorf）曾發表過一篇文章《科學和語言學》（Science and Linguistics）作為柯日布斯基的不無微名的“戰友”哈雅卡瓦的《行動中的語言》（Language in Action）一書的附錄，而這本書就是所謂“普通語義學”的可恥的著作之一。

① 《語言》雜誌，第12卷，1936年，第2期。

② 布龍菲爾德，（Linguistic Aspects of Science），紐約，1939年。

③ 例如參看他的《語言學作為一門科學的地位》（The Status of Linguistics as a Science），《語言》雜誌，第2卷，1929年，第4期。

這些都是表面上的事實。美國語言學的統治派別的“理論基礎”，無論是不可知論和主觀唯心主義的唯心哲學也好，種族主義的人種學也好，都同樣是由帝國主義的反動的意識形態產生的。世界主義者關於“超民族”語言的夢話，只稍微掩蓋着的種族主義的宣傳，對語言的社會本質的曲解，把語言和思維完全割裂開來，使語言變成“符號行爲”的形式之一，鮮明的反歷史主義，作為現代實證主義邏輯“形式化”的反映的語言學“形式化”——這就是在美國語言學中叫囂的那些“觀念”和“原則”。

*

*

*

布龍菲爾德的“學派”是現代美國語言學中最能產的派別。它常常以描寫語言學的名義出現，實際上是布龍菲爾德的“機構主義”或“物理主義”的進一步的“發展”。正是這個派別表現了美帝國主義語言學的特徵。它決定了個別語言的（英語的、匈牙利語的、日本語的、羅馬族語言的、美洲諸語言的）許多著作的內容，特別是決定了語言分析理論方面的著作的內容和方法。直到最近的時候，這一派別的論文在《語言》雜誌中（布龍菲爾德在這個雜誌的活動中曾起了許多年的領導作用），以及在其他期刊中佔着首要的地位。從布龍菲爾德的《語言》開始，許多教科書，一系列的通俗出版物，如卜洛赫（Bloch）和特雷則（Trager）的《語言分析綱要》（其中有一章是布龍菲爾德寫的）之屬，把那些反動的、反科學的觀念帶到了大學生的講堂裏來。最有意義的，他們在許多於1943年（這一年被看作最重要的關頭）發表的評述美國語言學學會20年活動的論文裏^①。慶祝了布龍菲爾德的機構主義“學派”對其他派別所逐漸取得的勝利。布龍菲爾德的“學派”因而自命為處在美國語言學界的統治地位上。關於這點，布龍菲爾德的反對者和門徒們都寫了文章^②。

① 參看《語言》雜誌，第19卷，1943年，第2期，198頁以後。

② 參看美國語言學家格雷（Gray）爲了反對布龍菲爾德及其“學派”而寫的論文，載於《語言學學報》（Acta linguistica），第5卷，1945—1949年，第2分冊，又賀爾（R. A. Hall）的評論，發表於意大利《語言學研究》（Ricerche linguistiche），第1卷，1952年，第2期。

美國的描寫語言學和歐洲的結構主義有着一系列的類似的因素。極端的反歷史主義，世界主義對語言的民族特點的輕視，把語言和人民歷史完全割裂開來，這些使到這兩個派別接近起來。但是歐洲的結構主義是在新康德派完形派心理學（Gestaltpsychologie）影響和索胥爾（F. de Saussure）語言學觀點統治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至於美國描寫語言學的“思想基礎”却是行為主義、實用主義和“邏輯”實證主義，形式正如布龍菲爾德的機構主義體系所反映出來的，可是採用了語言學的模樣——分析的原則和方法也是布龍菲爾德的。所有這一切都在美國語言學的統治派別上面打下了一個特殊的烙印。賀爾在一篇評論近 25 年美國語言學的專文裏直接指出，布龍菲爾德的《語言》一書包含了他自己的體系的最完整的說明，自 1933 年起就成了美國語言學家差不多所有一切著作的模範和指南，我們不認識它就無從了解近幾十年來美國語言學所由建立的最根本的基礎（le basi fondamentali）^①。

二

一切語言學體系的基礎都建築在對於語言的本質、它的特點、它的發展規律的理解上面，而這種理解又是為這個體系的哲學基礎制約着的。揭穿這些基本概念的內容可以確定個別的、具體的語言學問題的解決，其中包括語言材料的分析方法。例如在馬爾和他的門徒們的觀念中，對於語言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的不正確的、庸俗唯物主義的理解就決定了所謂古生物學方法的性質和對於一些具體的語言學問題的錯誤的解決。

語言學中臭名昭彰的“機構主義”或“物理主義”，也就是說，布龍菲爾德所創立的語言學體系，它的基礎就是由把語言看作行為的特殊形式構成的；這種行為的特殊形式由個人和環境的相互影響產生，並且被歸結為一系列無窮盡的刺激和反應。全部過程被歸結為

^① R. A. 賀爾，《從 1925 到 1950 年的美國語言學》（La linguistica americana dal 1925 al 1950），《語言學研究》，第 1 卷，1950 年，第 2 期，278、279 頁。

這樣的一個公式：個人對某種刺激(A)言語起反應，他的言語(B)又轉過來刺激他的聽話者，引起某種反應(C)。這樣，在布龍菲爾德看來，在言語活動中存在着兩方面——聲音的特性或聲音B，刺激和反應A—C。前者的研究，它們的描寫和分類，在布龍菲爾德的觀念中，就成了語言學的唯一對象。經驗中所有的語言事實表現成了形而上學的本質，事物的本身。對於“純粹的語言事實”的崇拜就是行為主義者理解語言本質的直接結論，“語言學機構主義”的觀念所特有的一連串荒謬原理和研究方法都是跟隨着這一個結論來的。

“語言學機構主義”的出發點是把語言確定為主要是生物學現象。語言被包括在人體中帶有任何生物學過程的系列中，同時被放在一個與動物的“類似信號的聲音”相等的平面上。例如狗吠和人類語言的主要區別，布龍菲爾德肯定說是在於它只有極其有限的聲音（總共三聲），所以（？——古赫曼）狗的“語言”沒有人的語言那麼多分別。在這一類的說法和比擬中，布龍菲爾德並不是獨一無二的。比方他的一個門徒^①在一篇題目極值得注意的論文《沒有意義的語言學和沒有詞的文化》中就曾不憚煩地對人的語言和鸚鵡的“語言”作過比較的分析，最後得出了一個意義深遠的結論：人類語言的基本區別是在於它的多形態性。這一“派別”的另一個代表認為把言語行為和咳嗽、打噴嚏等比較是有必要的；這些比較的結果是頗出人意外的。依照這位“學者”的見解，打噴嚏和人類言語的有些聲音雖然都是由相同的身體部分發出的，都只是生理物理的行為，但是咳嗽作為惶惑不安的標誌，或者非洲有些民族利用打氣隔來表示吃完了飯，就應該確定為言語行為^②。

看起來，類似這樣的傳奇式的“見解”甚至是不值得我們提及的，因為它們已經超出科學的範圍了。

① 伏格林 (Voegelin), 《沒有意義的語言學和沒有詞的文化》(Linguistics without Meaning and Culture without Words), 《詞》(Word)雜誌, 第5卷, 1948年, 第1期。

② 何傑特 (Ch. Hockett), 《描寫音位學系統》(A System of Descriptive Phonology), 《語言》, 第18卷, 1942年, 第1期, 3頁。

但是要知道，這些“思想”不是由如李、切斯(Chase)這一類的無知之徒和他們的同道表達出來的，而是由在美國語言學界佔有首要地位的語言學專家表示的；它們被刊載在語言學專刊的篇頁上，自命為權威，具有高度的科學性，並且對於美帝國主義許多語言學家和“哲學家”說來是典型的。這些都是美國語言學虛弱和墮落的真憑實據，我們把它們揭發出來就愈顯得有迫切的需要。

依照斯大林的定義，人類語言“是幫助人們從動物界劃分出來、結合成社會、發展自己的思維、組織社會生產、與自然力量作勝利鬥爭並達到我們今天所有的進步的力量之一”^①。可是在美國語言學家的發明中却被歸結為最簡單的反應和生物學過程，差不多等於狗吠。布龍菲爾德把人類言語活動的一切例子基本上都和利用語言來滿足最簡單的需要，首先是感到肚子餓，想吃蘋果等聯系起來，那並不是偶然的。

但是布龍菲爾德在這裏並不是獨創的，也不是獨立的：他只是追隨着行為主義者們，把他們當作自己的老師。行為主義把實用主義的荒謬觀念帶進心理學裏來，把思維和語言歸結為一連串簡單的刺激和反應，從而完全歪曲了語言的社會性，不知道語言是人類在社會勞動過程中創造出來的，語言把人類從動物界中劃分出來。人類不僅與環境互相影響，並且要改造環境，改造自然界這一個事實竟被他們忽略了。

行為主義者對於語言的生理學基礎的解釋是荒謬的，這一點用巴甫洛夫關於第二信號系統的學說來加以闡明就顯得特別清楚。

近年來這些“觀念”在美國變成了這樣能產，那不是偶然的。使人類文化受到玷辱，企圖磨滅人獸間的界限，反對人類的思維，這些正是美帝國主義匪幫的意識形態的特徵。這些特徵構成了那個“狗窩哲學”的本質，康福斯(M. Cornforth)在他的《保衛哲學》* (In Defence of Philosophy) 一書中已經替它蓋上了這個烙印，而語言學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1953年，46頁。

* 參看翟菊農等中譯本，1955年10月，三聯書店出版——譯者。

“機構主義”的首腦布龍菲爾德在一系列的原理中已經接近了這種“哲學”。

布龍菲爾德把語言歸結為純粹的生物學過程，忽略了語言特點中的基本的——它的社會本質。固然，他有一個附帶條件：有些生物學過程“附帶地”還是有社會性的。這就是那些發源於人們交際的過程；言語活動，就屬於這一種過程。但是就在“交際”這個概念裏面，布龍菲爾德也投入了他自己的“特殊的”內容，因為在他看來，動物也有“交際”。因此就這一個方面指出語言的交際職能時，他在語言的定義中不承認語言和獸類的“類似信號”的呼叫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這後者，按照布龍菲爾德的觀念，和語言一樣，都是交際的手段。此外，在布龍菲爾德看來，人類社會中的交際每一次都變成了對話，目的是要直接滿足生理上的要求，就是說，變成了完全相同的一系列的刺激和反應。可是在他的手中，正如在索胥爾的手中一樣，社會本身却被暗中偷換了兩個由言語行為聯系起來的個人。“A和B”，——布龍菲爾德寫道——，“即說話者和聽話者，就包括了整個世界”。

這樣對於語言的交際職能的曲解意味着他事實上對於語言的真正的社會本質一無所知，這不只決定於他歪曲了語言的本質，其根源是在於他對社會本身和它的發展規律有着唯心的，反科學的觀點。我們如果不認識社會的性質和它的發展規律就不可能揭露語言的本質，確定它作為社會現象的專門特點，研究它的發展的規律性。布龍菲爾德不懂得社會生活全範圍內的共同活動就是人們的交際的基礎。關於勞動創造人類社會，創造人類本身和他的語言這一事實當然是在布龍菲爾德的觀念之外的了。

要真正理解作為交際工具的語言的本質只有在關於社會及其發展規律的唯物主義學說的基礎上才是可能的。這個關於語言作為交際工具的學說第一次由馬克思和恩格斯構成。斯大林在他的關於語言學的卓越的著作中又發展了它。

斯大林在他的關於語言學的天才著作中把語言的這個交際職能極其深刻地和多樣性地揭露了出來。斯大林着重指出：“語言之替社

會服務，乃是作為人們交際的工具，作為社會中交流思想的工具，作為使人們互相了解並使人們在其一切活動範圍中調整其共同工作的工具，這一切活動範圍包括生產的領域，也包括經濟關係的領域，包括政治的領域，也包括文化的領域，包括社會生活，也包括日常生活”^①。

語言的應用範圍其實是無限的。沒有語言就不可能有任何社會的存在，任何社會活動的存在。

馬克思主義科學在把語言確定為交際工具的定義中包含有極其豐富的內容，這豐富的內容同時把現代美國語言學統治派別首腦的“理論的”論證的荒謬性、貧乏性和庸俗性揭露了出來。布龍菲爾德對於語言本質的荒謬的理解更可以由他對語言與思維的相互關係的問題的闡明方面很清楚地予以揭破。任何人對這個問題沒有正確的理解，那麼對語言的交際職能的本質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認識。

三

在關於這個問題的闡明上面，特別明顯的是布龍菲爾德同實用主義和“邏輯”實證主義有着密切的聯繫。布龍菲爾德是鮮明地和確定地站在極端實證主義和不可知論的立場上的。在這一方面，最有意義的是他那篇用很激烈的論戰的筆調寫來反對一切主張語言可以表現觀念和感覺的語言學家的論文《語言呢還是觀念呢？》^②。同樣的原理，雖然沒有這樣詳細，在他的著作《語言》中也有說明。這一場反對思維，反對觀念、概念，反對概括的論戰，他是用了實證主義的傳統的熟語來進行的，並且採取了主觀唯心主義和不可知論的毫不掩飾的形式。在這篇論文裏，他用了很典型的詞句聲明科學應該只從事於經驗中所有的事實的描寫和分類，可是思維、觀念、概念是經驗中所沒有的，因為是“誰也沒有看見過的”；在這篇論文裏，他控訴他的反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1953年，人民出版社，35頁。

② 布龍菲爾德，《語言呢還是觀念呢？》（Language or ideas?），《語言》雜誌，第12卷，1936年，第2期。

對者，說他們迷信形而上學，同時呼吁“真正的唯物主義”，但是很明顯地暴露出來的却是主觀唯心主義和不可知論。總而言之，實證主義者從馬赫（Mach），阿芬那留斯（R. Avenarius）到卡爾納普、杜威、羅素所用過的一切傳統的惡劣手段和方法的武器都給他搬出來了。

在布龍菲爾德看來，觀點、概念只是口頭上的術語，它們不與任何實際的事物相適應，只是“言語形式的同義詞”。

他首先把語言確定為生物學過程，一系列的刺激和反應，然後說思維就是語言，並且我們的關於客觀現實的概念只是言語的複合體，因此客觀現實就被他用完全相同的行為主義者的那一套給暗中偷換了。“語言學機構主義”的反動的實證主義者的基礎就是這樣以一種毫不掩飾的形式出現的。它同時確定了其餘的一些一般的和比較特殊的語言學問題的解決。

語言學上最重要的問題——語言和思維的相互關係的問題——被宣稱是虛構，是假問題。由此一步跳到了語言的“沒有意義化”和語言學的“形式化”，而這些就是布龍菲爾德的語言學體系的特徵。

馬克思主義教導我們，語言的本質和特點的定義是跟語言和思維的互相關係的問題不可分割地聯系着的。語言作為社會現象的特點，它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沒有對這一問題的正確的解決就不可能充分地揭露出來。語言的交際職能也只有與語言和思維的統一聯系起來才能充分地揭露出來。斯大林在他的關於語言的定義中常常把這兩個因素結合起來。他寫道：“語言是工具，手段，人們利用它來互相交際，交流思想，達到互相了解”^①。斯大林跟着發展了這個思想，他教導說，思想交流是“經常極端必要的”，因為沒有語言就不可能在與自然力量鬥爭中，在獲得必需的物質財富的工作中團結人們的力量，沒有語言，社會生產就成為不可能。

語言和思維的不可分割的統一無論如何也不意味着把它們看作

① 參看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1953年，20頁。

同一的東西。語言和思維各有它們自己的特點，自己的特性，自己的發展規律。同一的內容，同一的思想，表現在不同的語言中各有不同的語言形式，無論按語音來說，還是按語法結構來說，都是不同的。這一事實表明語言和思維的相互關係在直接的統一中還存在着極端複雜性。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只着重指出它的專門特點，它比起思維來有着相對的獨立性。

同時，很明顯的，我們要正確地理解語言和思維的相互關係，首先就要確定思維的真正性質和內容，這就是說，首先要解決關於物質和精神相互關係的基本哲學問題。因此，在資產階級語言學家當中，沒有一個能夠正確地解決這個最重要的問題，那是毫不足為奇的。可以作為特徵的，馬爾和他的門徒們雖然常常宣稱語言和思維統一的原理，但是不能正確地了解這個統一的本質，並且陷入了唯心主義裏面。

但是在語言學史中，闡明這個問題時對真理的歪曲，從來沒有像布龍菲爾德和他的門徒們的語言學體系這樣採用了這些反動的實證主義者的形式的。

四

布龍菲爾德把語言的本質歪曲到了極點，他在解決個別的語言學問題時在最大限度內閹割了語言的內容方面。這一點在他闡明語言單位的意義的問題時表現得最清楚。布龍菲爾德肯定說：“在機構主義者看來，任何形式的意義都只是說話者使用這個形式的情況和它在聽話者方面所引起的反應”^①。布龍菲爾德的全部著作都像紅綫一樣貫穿着語言形式意義的情況性質的觀念。他在詞的方面把這個觀念“發展”得最充分，但只部分地散佈於他對語法範疇的解釋上面。布龍菲爾德聲言：“要對每一個語言形式定出一個確切的意義，必須認識說話者世界中的一切”^②。在他看來，我們甚至要熟悉說話者的

① 布龍菲爾德，《語言》，紐約，1933年，139頁。

② 同上。